

一位好的宣传家懂得如何利用地图清晰表达自己的观点。政治说服通常涉及领土要求、民族、国家自豪感、边境、战略地点、征服、进攻、军队调集、防卫、势力范围、地区性不平等和其他便于用地图描述的内容。宣传家通过强调有利要素，隐瞒相互抵触的材料，采用煽情夸张的符号来操控地图信息。人们信任地图，因为引人入胜的地图既会吸引人们的眼球，同时也能蕴涵权威感。天真的民众乐意对那些带有偏见有时甚至歪曲事实的地图信以为真。

虽然宣传家、广告商、房地产开发商三者都将其观点强加于地图，但宣传家的目的与后二者还有所不同。广告商与政治宣传家都力图激发人们的需求，但广告商叫卖的是产品或服务，而非意识形态。二者都企图减弱来自公众的阻力，或是将稻草说成黄金，只不过广告商挂念的是商业和金融，宣传家们关心的则是外交或军事。房地产开发商与政治宣传家都需要得到官方许可或承认，但前者涉及的国土范围小得多，而且通常是无人居住的区域，没有官方许可，地产商很少能单方面行动。二者都有对手，但开发商的对手通常是附近的业主、环保人士或历史保护主义者，政治宣传家通常要面对的则是不甘沉默的少数民族、其他国家、国家联盟、对立的意识形态或广为接受的是非标准。由于宣传地图 (Propaganda maps) 可能大多是全球或洲级地图而非局部地图，因此政治宣传家比广告商或房地产开发商，有更多的机会对地图投影或设计做手脚，从而歪曲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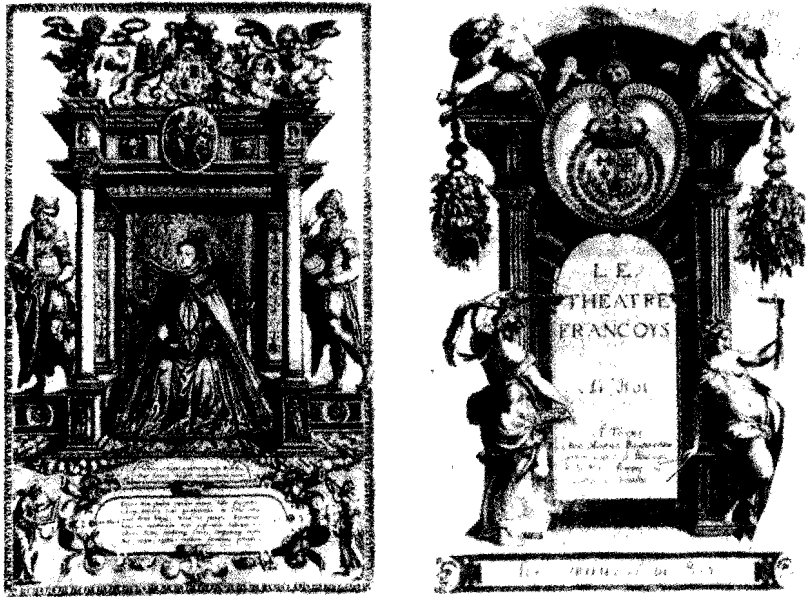
本章探讨了地图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的复杂的多重角色。第一部分考察了地图作为政治图标——即权力、权威和国家实体象征的功能。其次，本章还审视了地图投影如何使区域膨大或缩小，抬升或降低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地图投影本身如何被用来支持某些地区，同时压制另一些地区。再次，考察纳粹宣传家对地图的操纵，看他们如何利用地图使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扩张合法化，并试图使美国保持中立。最后一部分集中讨论几种最受地图宣传家青睐的符号：箭头、炸弹、圆圈和地名。

大大小小的地图图标：作为权力和国家象征的地图

地图是国家的绝好象征符号。如果你所在的大公国或部落区日渐衰落，边疆离析，你只需取张纸画幅地图，圈出一些城市、道路和自然地物，用粗线画一条醒目的边界，你敢要多少领土就把边界划到哪里，然后在边界内涂上颜色，给地图取个名字——为了增强效果，或许还要加上一个令人难忘的“共和国”这一“后缀”——说变就变：你现在就成了一个刚刚诞生的独立王国的领袖。单单指看地图，难道有谁会怀疑它吗？你的新国家不仅写在纸上，它还落在地图上，所以它一定不会有假。

如果说以上地图作为国家象征的说法似乎有点牵强，那么让我们看一看英国和法国在16世纪晚期制作的国家地图集 (National atlases) 吧。受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委任，克里斯托弗·萨克斯顿 (Christopher Saxton) 对英国和威尔士 (Wales) 全境做了一次地形调查，并制作出版了一本手工上色的精美地图集。为给女王统治她的王国提供有用的信息，该地图册将若干种英国郡县地图汇集到一起，宣称这些地区全都处于女王的统治之下。这本象征意义丰富的地图册的扉页是一幅装饰繁缛的雕版画像 (图 6.1 左)，表明女王是地理学和天文学的资助者。几十年后，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为了庆祝不久前王国的重新统一，委命书商莫里斯·布格罗 (Maurice Bouguereau) 准备了一份与英国相似、详尽且装饰精美的地图集，与萨克斯顿地图集一样，法国国家地图集 (Le theatre frangoys) 上也有一幅令人难忘的雕版画像 (图 6.1 右)，它宣扬着国王及其王国的荣耀。两本地图册中，既有众多表现地理细节的区域地图，也有一幅单独的全国地图，二者共同宣告了国家的统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国家掀起了独立的浪潮，纷纷以国家地图集作为其国家象征。尽管西欧和北美的几个国家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已经出现了由国家资助制作的全国地图集，但这些地图集大部分是作为参考著作和科学成就的标志出现的。但是，从1940年到1980年，由于前殖民地国家纷纷利用地图这一工具谋求经济发展和政治认同，



89 图 6.1 克里斯托弗·萨克斯顿 1579 年制作的英国及威尔士地图集 (Atlas of England and Wales, 左) 和莫里斯·布格罗 1594 年制作的法国国家地图集 (右), 其中的版画体现了地图和地图册作为国家象征的图标意义。

90 国家地图集的数量遂从不到 20 种增加到 80 种以上。在为国家提供服务的过程中, 地图和地图集往往扮演着双重角色。

新兴的民族国家之所以急于用地图宣告独立, 或许正好反映了殖民列强利用地图这种智力工具, 使其领土征服、经济掠夺和文化帝国主义的行径合法化。欧洲国家瓜分非洲等异教徒的土地, 声称对其土地和资源拥有主权, 毫不顾及已经存在的社会与政治构架, 地图则为以上行径提供了便利。知识就是力量, 探险家们借助粗糙的地图, 与各民族签订条约, 其中的条款彼此冲突。不费一兵一卒, 外交官和将军们绘制的地图最后变成了政治现实, 正所谓“笔头强过刀剑”。

地图作为国家象征和知性武器的作用, 最显著地体现在领土争端中, 当 A 国与 B 国都宣称对 C 地拥有主权时, 他们常常也会展开地图大战。几十年前, A 国击败 B 国, 占领了 C 地, 于是在地图上将 C 地并入 A 国。A 国地图接受 C 地后, 只会在标识其他省或亚区的时候提及它 (一般不

会标出 C 地地名)。如果 B 国惨败, 它的地图可能将 C 地标识为一块有争议的领土。与 A 国地图不同, B 国地图总会标出 C 地地名。如果 B 国觉得发动战争的时机较为成熟, 或者认为 A 国因内乱国力衰弱, 它就会更为大胆地否定原有的政治现实, 在地图上“吞并”C 地。

中立国绘制相关地图时如履薄冰, 小心异常, 他们会将争议地区涂色或加上阴影, 一方面反映 A 国对 C 地的占领, 另一方面可能在旁边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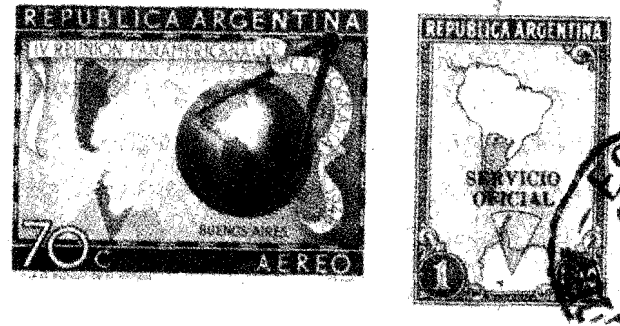


图 6.2 阿根廷发行的邮票上或隐或现的地图宣传

一行小字说明，承认 B 国的领土要求。如果 A 国与 B 国对 C 地名称不同，则标上 A 国的名称后，有时还在括号内插入 B 国的名称。（即便 B 国不大可能重新占领 C 地，制图者也乐意两边都不得罪。）在地图上做到中立可能很不容易，因为纵使自以为做到了中立，B 国的海关人员有时也会禁止那些承认 A 国对 C 地拥有国家主权的出版物入境。如果 A 国对 C 地的统治已高枕无忧，其海关检查人员就会显得大度一些。

即便是印在邮票上的小地图也会成为政治宣传的手段。国内邮件上的邮票地图可以鼓舞士气，国际邮件上的邮票地图则暗示着国家统一和维护统一的决心，靠这些小而多的邮票地图也能声张其领土要求。如图 6.2 所示，阿根廷发行的邮票大力宣扬本国对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即马尔维纳斯群岛（Islas Malvinas）及其以东的英属岛屿，还有南极洲的领土要求。与所有的阿根廷官方地图一样，这些邮票将这些岛屿贴上“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西班牙语标签，以否认英国占领它们的合法性。对于新兴国家和雄心勃勃的革命运动而言，带地图的邮票也同样可以成为有用的宣传工具。

94

面积、同情心、威胁和重要性

有时，宣传地图企图使一个国家或地区看起来更大、更重要，有时则需要这个国家或地区看起来弱小和受胁迫。在前一种情况下，地图可能是为了支持对公平的诉求：第三世界（Third World）很大，所以需要消费更大的世界资源份额，需要在诸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等国际政治实体中取得更多的支配权，需要从西方和共产主义世界的较发达国家获得更多关注与发展援助。在后一种情况下，地图可能夸大某个大国或国家集团对某一小国的威胁。例如，图 6.3 就描绘了一幅地图上的大卫与巨人歌利亚（Goliath）的搏斗，即小小的以色列与国土面积广阔、富产石油的阿拉伯邻国之斗的搏斗。即便地图上的地理事实准确

无误，这幅对比国土面积的地图也不会告诉我们任何有关以色列的发达科技、精密军事部署，以及它与美国等西方列强结盟的情况。

一些地图投影方法可以帮助宣传家把某些小地区放大或使某些大地区变得更大。从来没有人像 16 世纪的地图集出版商和地图学家杰勒德·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那样，为追求面积变形滥用投影法。墨卡托投影是专门为协助导航员设计的，这种投影法剧烈放大向极地区，以便使恒向线或等角航线——也就是地理方位保持不变的线，成为一条直线（如果航海者的罗盘显示的是正北，而不是磁北，等角航线也可以被称作罗盘方位恒向线）。如图 6.4 所示，导航员画一条连接出发地 A 到目的地 B 的直线作为等角航线，然后读出等角航线与子午线之间的夹角 θ 。如果从 A 出发一直沿此角度航行，最后就可以到达 B。由于此法简便易行，航海者就必须放弃更短但不易领航的大圆航线，并且接受地图上从标准线向两极地区递增的面积变形。事实上，这种投影法几乎没有表现北极圈和南极圈内的区域，因为这种投影使两极与赤道之间的距离变为无限远。不过，由于提防冰川，几个世纪以来，航海者总是避开极地水

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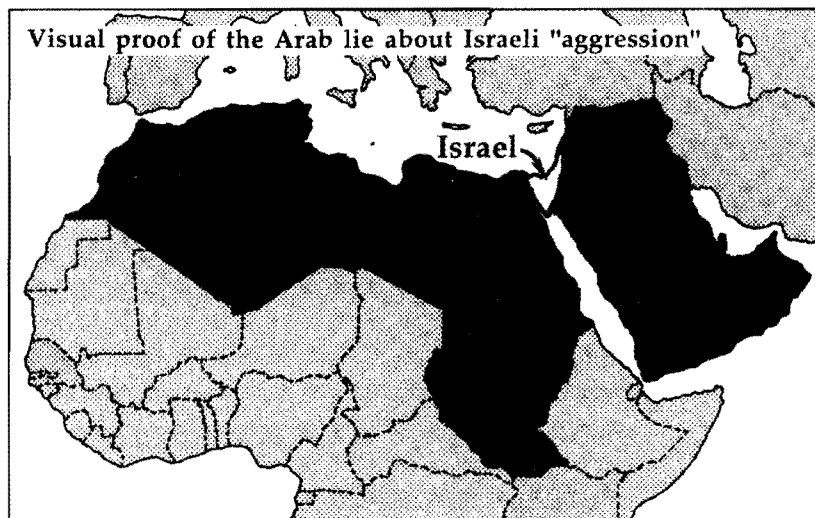


图 6.3 此图表现了周邻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包围。根据 1973 年战争中加拿大犹太人国家基金会出版的一幅地图重绘。

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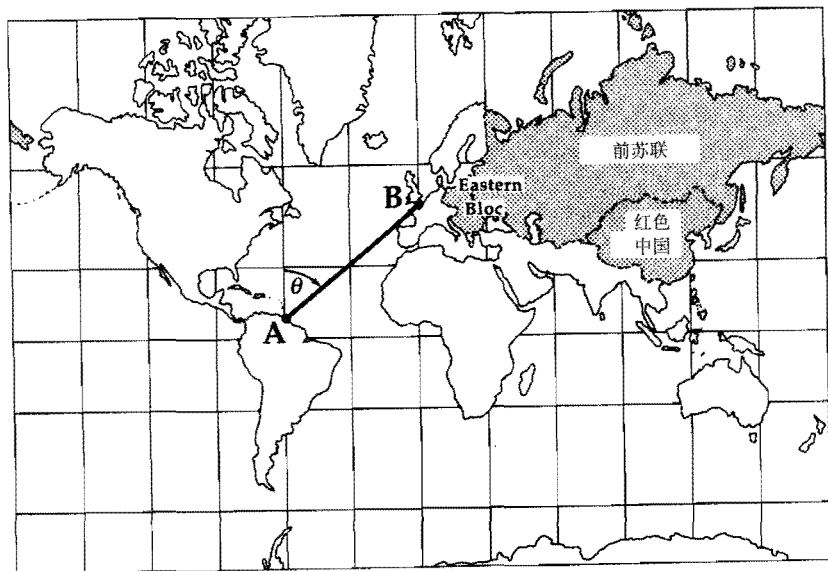


图 6.4 墨卡托世界地图显示方位角 θ ，沿此角度是从 A 到 B 的等角航线，红色中国，尤其是前苏联的面积被夸大。尽管墨卡托投影是为协助航海者设计的，但这种投影法也被政治宣传家用来夸大共产主义的威胁。

域，所以，由墨卡托投影的面积夸大给航海者带来的影响很小。近几十年来，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斯大林主义者暴行感到恐惧的约翰·伯奇协会 (John Birch Society) 和其他政治团体，表现出对放大前苏联版图的墨卡托地图的极大兴趣。该协会发表演讲时，用的就是一张很大的墨卡托世界地图，其中前苏联和中国被印刷成刺眼的、象征性的大红色，以此警告人们提防那一时期广泛存在的红色威胁。

尽管至迟在 1772 年就出现了等积地图投影 (Equal-area map projections) (见图 1.5 和图 1.6)，因为那时约翰·海因里希·兰勃特 (Johann Heinrich Lambert) 已经发表了他的经典之作《论数学的价值及其运用》(*Beiträge zum Gebrauche der Mathematik und deren Anwendung*)，但是，许多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教室挂图，还是以墨卡托投影为地理框架，甚至较新的电视新闻节目布景和播放官方简报的房间背景，也使用墨卡托地图。也许因过于关注航海、探险和时区，教师和电视布景设计者们都在地图上犯了目光短浅的毛病，他们呈现给观

众的是一幅畸变的世界图景，它通过削弱热带地区的意义，来增强加拿大和西伯利亚、西欧与美国的重要性。墨卡托地图恭维大不列颠王国的方式深得英国人的欢心，因为它的一条中心子午线正好横穿格林威治 (Greenwich)，并突出显示那些远离英国，位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南非的英属殖民地。一些英国地图为了给大英帝国多造一些声势，甚至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地图左右两边重复出现。

然而，到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这种微妙的，或许是无意的政治地理宣传，成为德国历史学家亚诺·彼得斯随手树立的假想敌，他发表了一幅“新的”世界地图，但实际上，彼得斯的等积投影方式与 1855 年苏格兰牧师詹姆斯·高尔 (James Gall) 描述的投影近似，因此确切地讲，这种投影应称为“高尔—彼得斯投影”。如图 6.5 所示，高尔—彼得斯投影 (Gall-Peters projection) 使热带大陆略微变小并呈拉伸状，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地理学家和地图学家 (不青睐高尔的投影)，而接受较之更为合理的其他等积地图，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彼得斯参考的地图投影基础文本不提及高尔的贡献。事实上，兰勃特和其他地图学家开发了很多种等积投影方式，不少投影法对形状的扭曲都没有高尔—彼得斯投影那么严重。

但是彼得斯博士知道如何鼓动群众。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出身的历史学家，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政治宣传，彼得斯曾召开新闻发布会谴责墨卡托的世界观 (包括所有的非矩形投影)，他在兜售自己的投影法时称其“忠实于面积”，更加精确、“更加平等”地表现地球。他提醒人们注意墨卡托地图对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轻描淡写，并将这一问题归咎于地图学发展的滞后，彼得斯的言论深深打动了世界基督教协进会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美国路德教会 (the Lutheran Church of America) 以及各个联合国组织，引起它们的强烈反响。宗教和国际发展组织热烈欢迎彼得斯及其“新地图学”，因为它承诺了更多的公平和更高的精度。他们还出版了大大小小的彼得斯投影地图，将其悬挂于墙壁，或用于新闻发布会和出版物之中。也许因为新闻记者也乐意保卫被压迫者并为之而战，所以报界反复宣扬彼得斯的主张，并报道他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的成功。这使学院派地图学者大为不解且极其愤怒——

他们不解的是，媒体和那些声名显赫的机构为何如此愚昧轻信；愤怒的是，这些团体不断重复彼得斯荒谬可笑的陈词，却绝对无视既往地图学的著述、成就以及丰富的历史。

并不是所有的地图学家都缺乏幽默感。美国地质勘探局的地图专家约翰·施奈德 (John Snyder) 本人曾经开发过好几个实用且有创意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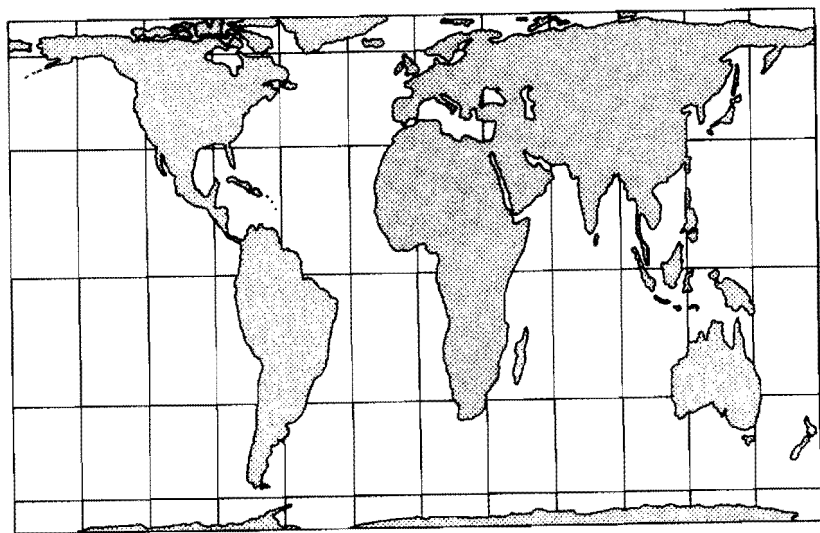


图 6.5 彼得斯投影，确切点讲，是高尔—彼得斯投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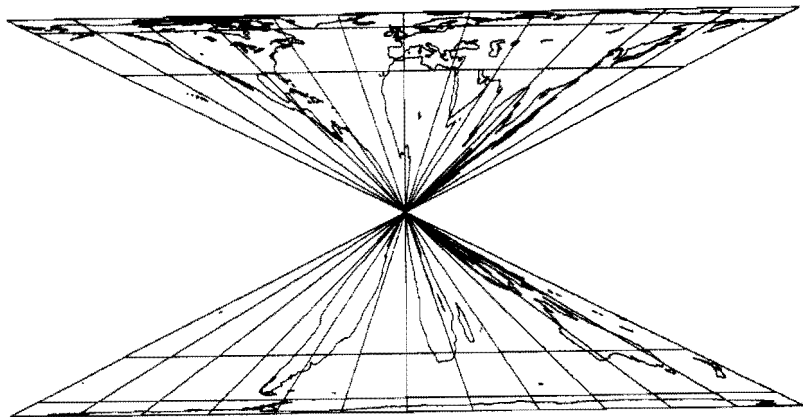


图 6.6 约翰·斯奈德 (John Snyder) 设计的沙漏式等积投影 (Hourglass equal-area projection) 与所有的等积投影一样，忠实于面积但会扭曲形状。

图投影法，他拿出一种风趣的等积投影来支持地图学界同行的观点，即等积地图并不一定就是好地图。如图 6.6 所示，施奈德的沙漏状等积投影所做的正是彼得斯做过而墨卡托没做过的——这种投影保留了面积关系，同时它也形象地说明，忠实于面积并不等于忠实于形状。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迫于彼得斯的宣传攻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其他对第三世界问题敏感的组织，还是忠实地支持这种错误的投影方式，并错过了一个个大好的宣传机会。这些组织不加分析地接受了一种很难立足的假说，即一幅对人民负责的地图应该精确地表现土地面积，不仅说明这些组织在地图方面非常幼稚，而且说明他们并不知道还有一种更为人道主义的投影方式，可以合乎情理地表现第三世界国家庞大的人口。在人口统计底图或者类似于图 1.10 的区域统计图中，每个国家的面积是与其居民数量成比例的，倘若媒体为一幅这样的地图做宣传，是不是比彼得斯投影更有信服力呢？的确如此，区域统计图能比彼得斯投影更为有效地提升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人口大国的重要性，同时如实反映加拿大、美国、前苏联和其他人口相对稀疏的国家较小的人口数量。但是，或许出于一种微妙的内在需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领导人还是对彼得斯投影情有独钟，因为相比其他投影，彼得斯投影对人口密度较小或中等的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更为友好——的确，针砭时弊者可能注意到非洲外交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的影响，以及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在拉丁美洲和中部非洲的切身利益，那一带正是基督教使团活动十分集中的区域。

99

宣传地图与历史：寻求解释与辩护

宣传性地图的历史可能并不比地图本身的历史年轻多少，在这一历史中，1933—1945 年间统治德国的纳粹理论家们还是特别值得一提。没有任何其他团体能像他们一样，如此明目张胆、偏执狂热、花样百出地将地图用作知识武器。为了使美国增进对德国的同情，减少对英法支持，

不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至少将这种状况拖延到轴心国占领欧洲之后，纳粹宣传家们精心挑选了一段历史并加以歪曲，专门用于对美宣传。这一部分讨论的事例来自新闻周刊《事实评论》(Facts in Review)，该杂志于1939年、1940年和1941年由德国资讯图书馆(German Library of Information)在纽约市出版。

纳粹的宣传性地图有一个唤起人们同情的主题，即提醒人们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败的事实——这一屈辱加上随后的经济萧条，促使国家社会主义者掌权。图6.7对比了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困境，宣传其一贯的反英主题。这两幅地图占据了1939年12月8日《事实评论》头版的大部分版面。1914年地图左侧有一行标题称，对德国的包围，“为英国成功实施饥饿封锁打下了必要的基础”。而1939年地图上的标题则称，“与东部和东南部进行工业与经济合作的道路仍然敞开着”，暗示英国再次包围德国的企图已经宣告失败。请注意，1939年地图顺手将德国当时的主要盟国，墨索里尼(Mussolini)的意大利和斯大林的俄罗斯，与瑞士等中立国归为一组。

1941年初，另一张地图通过对比德国在1914年的战略失利和1940年的崛起，企图为德国向西侵入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以对抗英国的事实，进行解释与申辩。图6.8将1914—1918年德国海军被英国封锁于北海，与1940年前者“突进大西洋”进行了对比。那时希特勒还没有与斯大林反目，地图标题也显示，1914年德国必须在两条或三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但“今天这样的危险不复存在。英国的封锁也失去作用，而且，这些封锁者本身还正在被封锁”。1914—1918年地图上的弧线强化了封锁的主题，而1940年地图上的粗线箭头则形象地表示，德国可以更为自由地出入大西洋。

另一幅纳粹地图试图转移人们对英国的同情。图6.9是两幅题为“帝国研究”的地图，87,000,000德国居民仅能以264,300平方英里的土地“维持生存”，相比之下，人口仅46,000,000的英国人却拥有13,320,854平方英里的土地。左边的地图问：弱小的德国怎么可能成为侵略国？与此形成对比，右边的地图向人们暗示英国的贪婪，它占领了世界上26%的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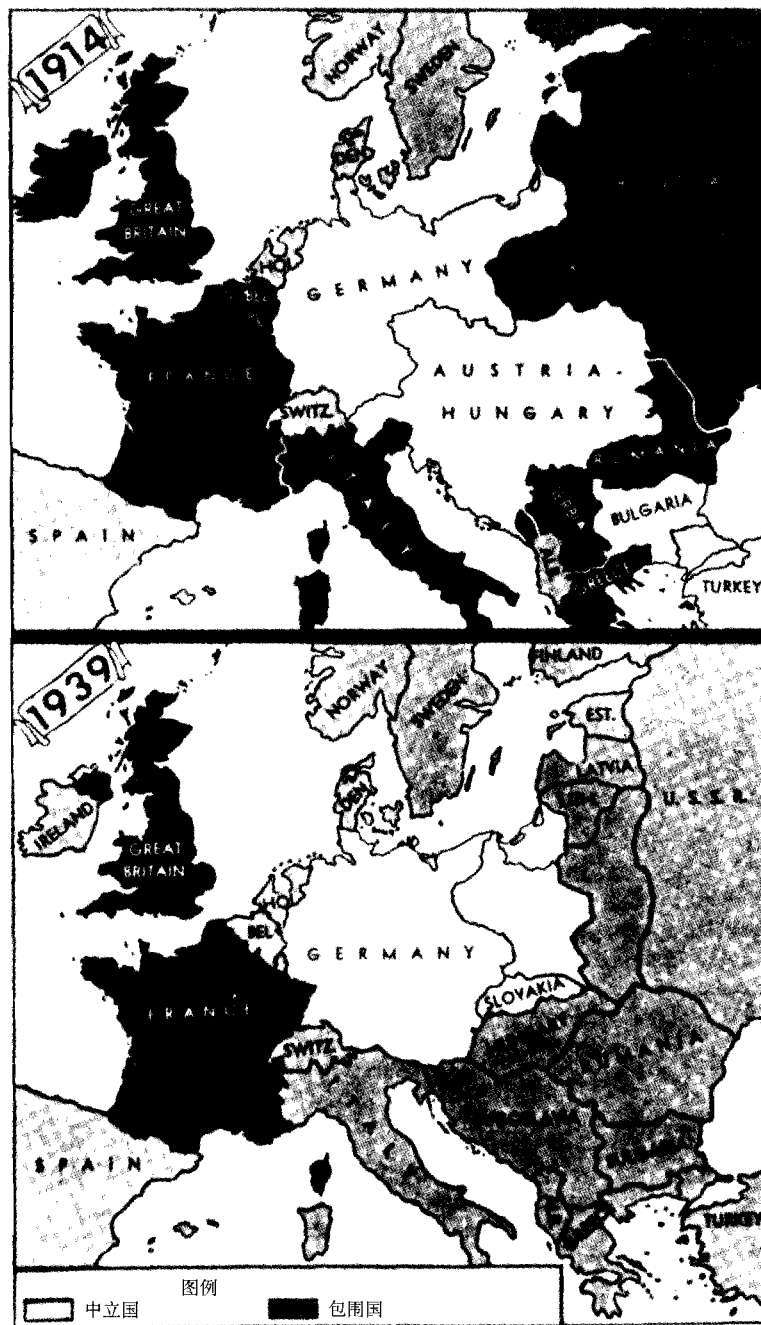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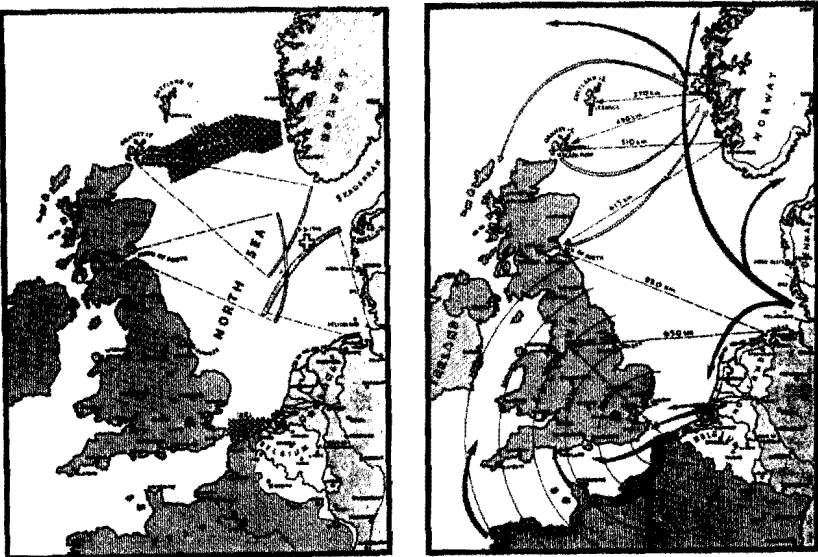


图6.7 “1914与1939，那时和现在”（《事实评论》1卷17期，1939年12月8日，第1页）



1914—1918年，被封锁的德国舰队

1940年，德国突进大西洋

图 6.8 “地图中的战争”（《事实评论》3卷16期，1941年5月5日，第250页）

地。从地图说明上，还可听到一层捎带不满的弦外之音，即大英帝国囊括了曾经的德国殖民地。

《事实评论》的编者还利用地图质疑英国的诚实。在1940年11月30日出版的《事实评论》中，有一则题为“英国的轰炸——大不列颠的真实记录”的报道，据称，11月24日，一架驶往热那亚的英国轰炸机，显然因迷失方向而误炸了法国马赛。但是，《大不列颠早报》（*Early British*）的新闻报道不仅否认此次轰炸，而且还对德国进行谴责。《事实评论》刊出一幅标有这两座城市的地图（图 6.10），并加上一个讽刺性的标题：“错把马赛当意大利热那亚，可它们相距 200 多英里。”这则报道抓住英国人的错处不放，提醒人们注意与炸弹同时投放的反意大利传单、轰炸造成的 6 死 12 伤（这 18 个人全都是妇女）、维希政府的抗议以及英国人“编造的蹩脚故事：由于大雾和经验不足，英国飞行员错将炸弹投放到非作战区的城市”。

纳粹的宣传家们还利用传真地图来证明敌人的背弃信义，为德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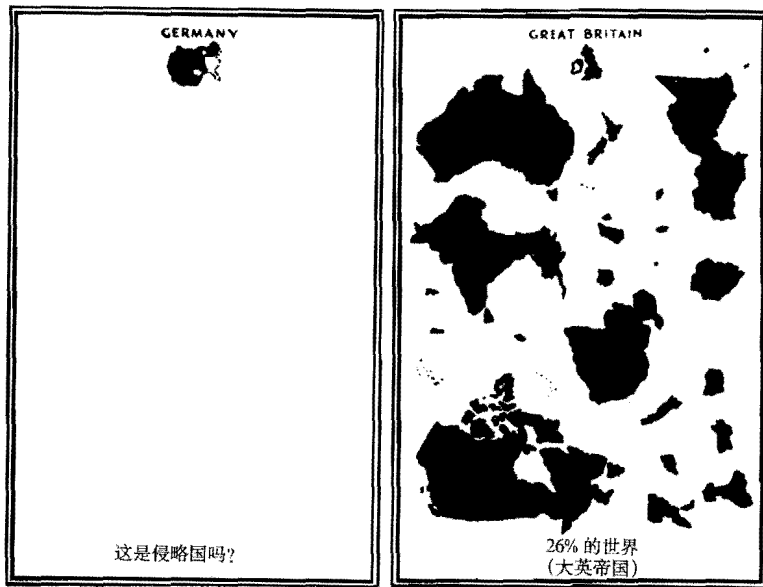


图 6.9 “帝国的研究”（《事实评论》2卷5期，1940年2月5日，第3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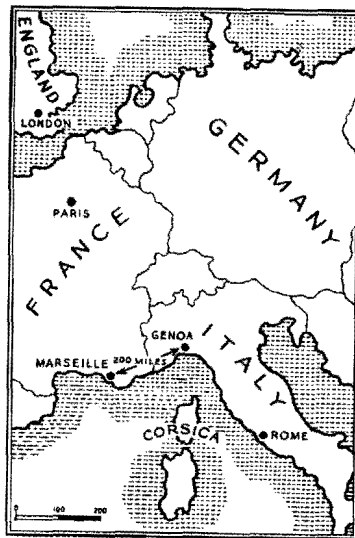


图 6.10 “错把马赛当热那亚”（《事实评论》2卷46期，1940年11月30日，第56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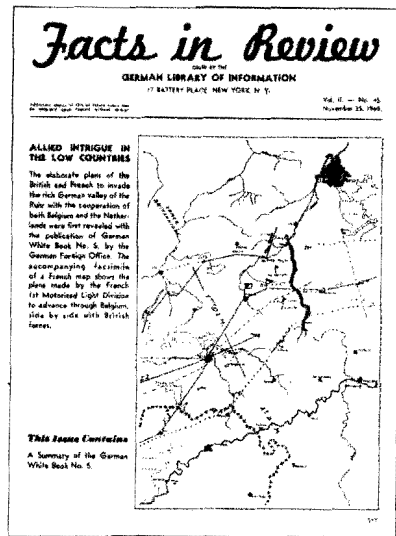


图 6.11 “低地国家的结盟诡计”（《事实评论》2卷45期，1940年11月25日，第557页）

西线进攻进行辩护。1940年11月25日《事实评论》封面是一张大部分版面模糊不清、满是人工注记的地图(图6.11),宣传家认为,不易起疑的美国人很可能对这幅地图信以为真,以为它正是英国和法国计划“在比利时和荷兰的配合下,入侵富裕的德国鲁尔河谷”的可信证据。而德国,如地图所暗示的那样,只是先发制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

《事实评论》中的另一幅地图还为德国和俄罗斯瓜分波兰进行辩护。图6.12是一幅标题为“波兰人的辉煌梦想”的地图,其上以深黑色标示的德国面积大为缩小。编辑义愤填膺地写道:“这幅地图刊于波森(Posen)的一家报纸《波兹南斯基日报》(Dziennik Poznanski),波兰人收到张伯伦的‘空头支票’后,复燃将波兰领土扩张到威悉河(Weser River)的妄想。”尽管报纸上的地图并不能代表国家政策,但这张地图可以使那些政治幼稚者以为,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是波兰人的自作自受,谁要他们痴心妄想吞并德国人的领土呢。

地图既可以把一个人的对手描绘成坏蛋,又可以帮助这个人把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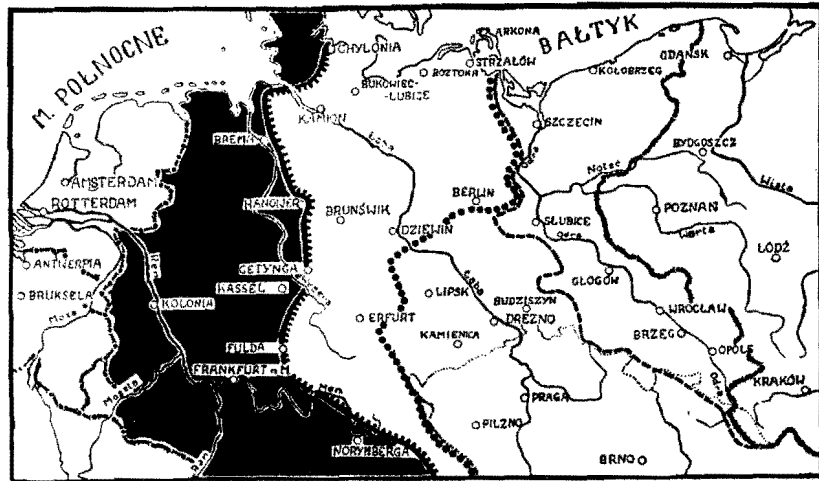


图 6.12 “波兰人的辉煌梦想” (《事实评论》2 卷 28 期, 1940 年 6 月 18 日, 第 294 页)



图 6.13 “遣返: 和平的背景” (《事实评论》1 卷 16 期, 1939 年 11 月 30 日, 第 3 页)

宣扬成好人。图 6.13 是与一则题为“遣返: 和平的背景”的新闻报道配套的地图, 表现和事佬德国为减少波罗的海国家的民族摩擦, 默默遣返 80,000—120,000 德国人的事迹。《事实评论》得意地评论道:“德国从来就不害怕修正地理和历史的错误。”地图用图画符号形象地表现了这次遣返, 图画中的德国人显得骄傲、勇敢、服从命令, 他们紧握行李箱, 正列队上船, 这些船将“带着失散的德国人回到第三帝国的家”。往东, 一

片空旷、阴森、令人窒息的黑色地带代表前苏联；往南，一片纯净洁白、充满希望的区域就是德国。

纳粹企图说服美国保持中立，其地图宣传家于是将孤立主义与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吹捧得天花乱坠。图 6.14 是一幅题为“影响范围”的地图，它用粗线向美国人传递了一条明白不过的信息：待在你自己的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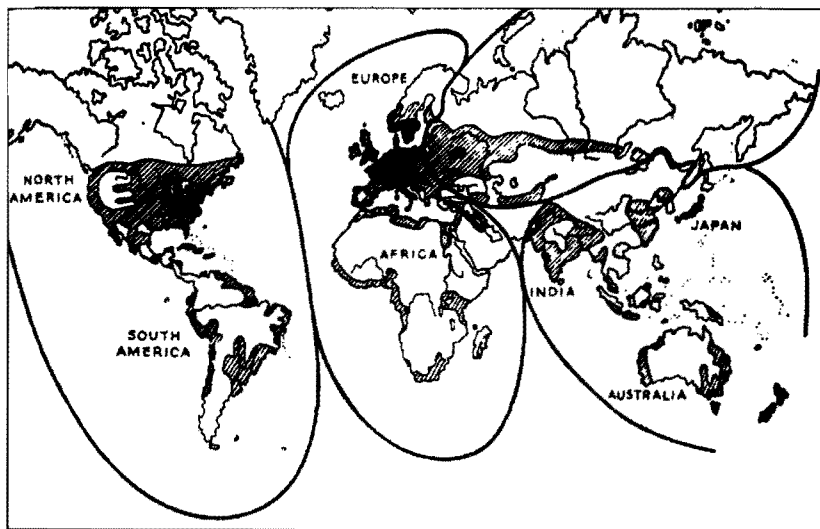


图 6.14 “影响范围”（《事实评论》3 卷 13 期，1941 年 4 月 10 日，第 182 页）

球，远离欧洲事务。许多学者对这幅略似古德分瓣投影（图 1.6）的地图都会有些眼熟，这幅地图同时也为德国的太平洋盟友日本搭建了一处政治地理舞台。尽管如此，纳粹的地图攻势究竟胜算多大还是个问题，因为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美国便与英国站到一边，介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箭头、圆圈、地名和其他地图攻击武器

极少有地图符号比箭头更具表现力和暗示性。在同一类人群的聚集

地当中划出一条粗实线，读图者会认为这条线就是相邻国家之间明确界定、广为接受的边界线，那么用一个或一连串箭头则可以形象地表现越境袭击，箭头符号还可用来夸大军队集结的程度，甚至可以为“先发制人的突袭”进行申辩。如图 6.15 所示，不同大小、数量和排列方式的箭头，可以用来表现不同程度的军事冲突，从颠覆性威胁和勇力对峙，到取胜程度不一的入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Korean War）中，许多美国报纸刊登每日战地地图，向读者简要介绍每一次交锋中盟军的胜败，其上频见富有表现力与暗示性的箭头。在图 6.16 上，箭头和代表被占领地带的黑色区域看起来格外醒目，它们形象地表现了敌军向前推进带来的威胁。

更为形象化的炸弹或导弹状符号，堪称箭头的姊妹符号。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两类符号，想起其所指会让人不寒而栗。成排的微缩导弹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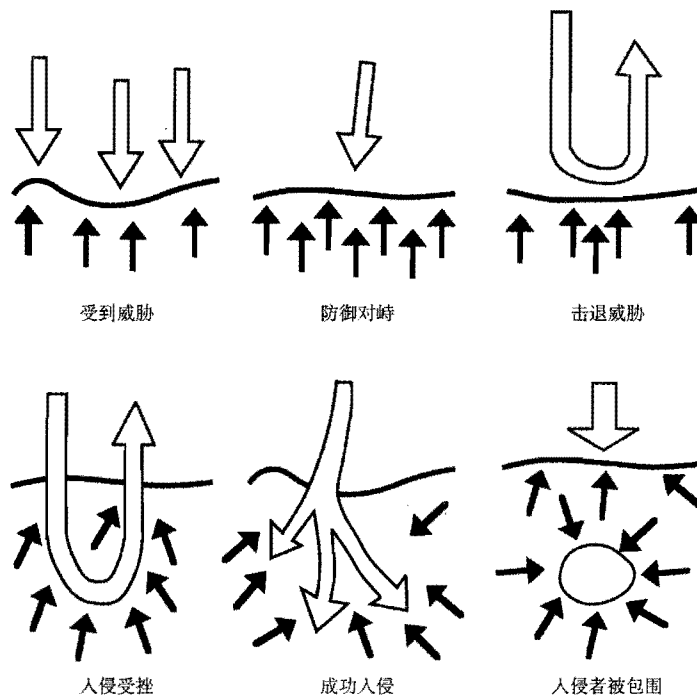


图 6.15 箭头表示各种各样的军事调度和军事对峙

和成堆预示不祥的红色或黑色炸弹符号，容易使读图者对敌对双方军火的相对存量产生深刻的印象。同时，军火符号的方向也很重要：炸弹水平储存但垂直投放，导弹垂直放置但水平发射。为了证明增加防御预算的必要性，宣传者甚至不惜在地图上模拟一场小型核攻击，并以成功反击收尾。地图甚至可以使核战争看起来不具毁灭性。

核战争的幽灵使那些受到威胁的国家和全球的和平主义者，从军火图形库中找到了一种常用来表现政治地理攻势的符号——圆圈。外交家和军事战略家发现，圆圈特别适合表现空袭地带，而现代战略家发现，在讨论导弹射程时，圆圈这种符号也必不可少。圆圈给地图带来的几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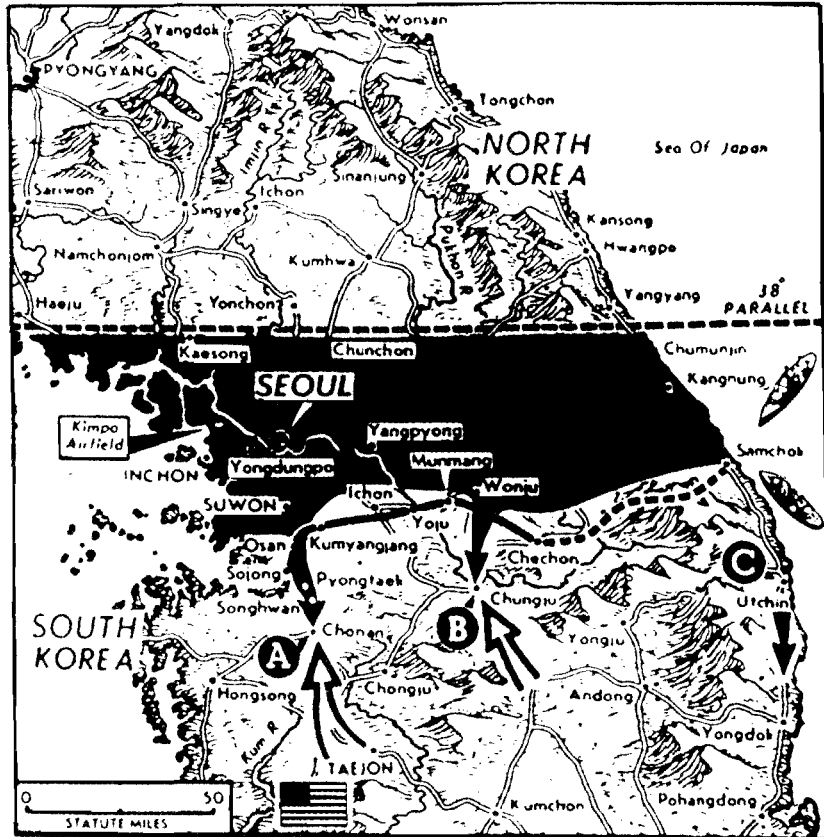


图 6.16 在一幅 1950 年美联社发布的报纸地图上，黑色阴影用来标明被朝鲜军队入侵的韩国领土，箭头表示军队推进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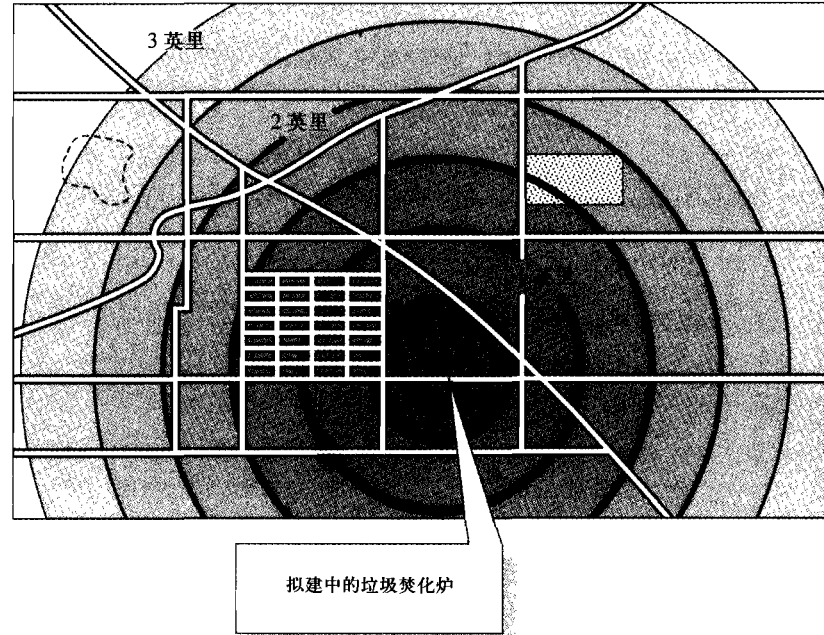


图 6.17 某地方环保组织为赢得市民更多的支持，设计了这幅几何宣传地图，圆心为拟建的垃圾焚化炉，依次加粗的同心圆表示，越接近焚化炉，危险越大。

纯粹性，容易被误以为等同于精确度与权威性。不过，在少数小比例尺地图上，当圆圈从球体转化到二维平面时，其形状的确可以保持不变。一些地方环境活动家也发现了圆圈的用处，尤其是在表现拟建的焚烧炉或核电厂时，可以以它们为圆心画出许多同心圆，如图 6.17（图版 7）所示，越接近圆心，圆圈越粗，表示危险程度越高。

命名也可以成为地图宣传家的强大武器。地名 (Place-names, Toponyms)，不仅可以使不见经传的地点成为重要的文化景观要素，而且可以暗示区域特性与民族忠诚。即便许多地图并没有刻意设计宣传性暗示，但也可能无意间冒犯当地居民或混淆视听，比如将地名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如从 Trois Rivières 到 Three Rivers），或者将地名音译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如从 Moskva 到 Moscow），或者从一种拼音形式变成另一种拼音形式（如从 Peking 到 Beijing）。老道的宣传家常通过压制或提升某个族群的地名影响力，来改变读图者对多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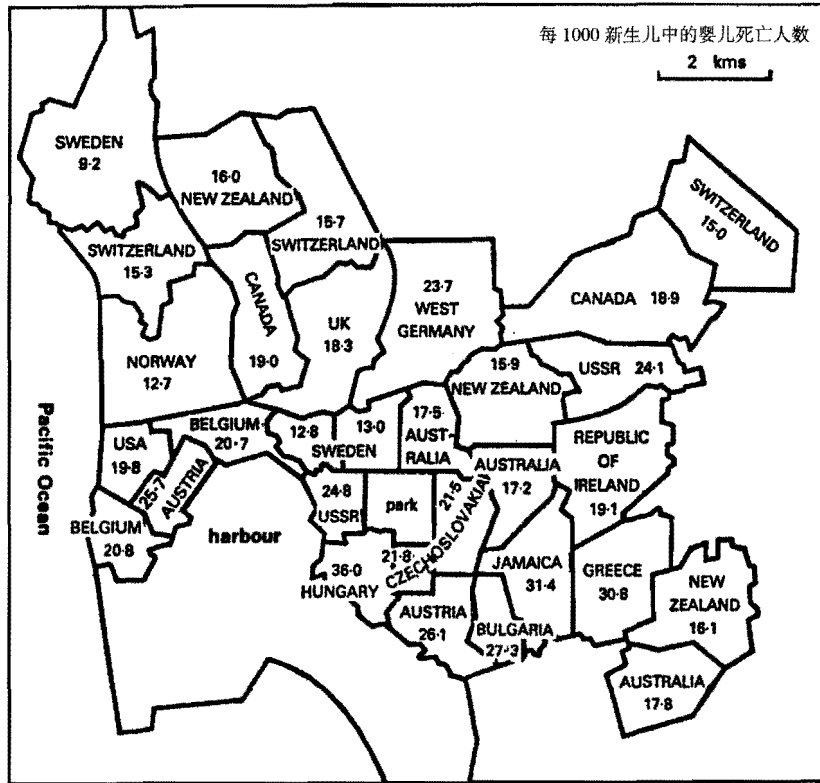


图 6.18 比较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部分地区与不同国家全国婴儿死亡率的奇趣地图

群文化景观的印象。

地方社会活动家还可以利用地名的暗示性力量在地图上表达自己的观点。例如，图 6.18 是一张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婴儿死亡率地图，这张图强烈控诉了中心城区母婴保健的不平等。如图所示，城市的某些社区，母婴保健水平可与瑞典、瑞士等西欧发达国家相提并论，而相邻的其他社区则只与匈牙利和牙买加近似。图 6.17 与 6.18 都说明，宣传性地图也可以成为有效的知识武器，用以抵制不负责任和带有偏见的、腐败的地方官僚机构。如同一根条形物可以是枪支，也可以是曲棍球棒，地图可好可坏，这取决于谁掌控它们，使用地图的目的为何，地图怎样被使用以及为什么这样使用。